

溃败与投降时期的战略

1. 举棋不定的守势战略

退守绝对国防圈

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是对华战局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发动的,而日本“决心对美英开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针对美国强硬要求我自中国全面撤兵,为了自存自卫不得已采取的决策,是以解决中国事变和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目标而专意前进”。^① 所以,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延长和扩大。

日本在对华战争的困境中又发动胜算无望的新战争,犯了兵家大忌。孙子早就说过:“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形篇》)日军明显的战略错误似乎很难让人理解,但从日军的战略原则看,经过多次修改的《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确立的“攻势原则”,决定了日军必将不断发动无止境的作战。再者,日军战略传统深受德国军事战略影响,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毫不停顿地进行着,直到对方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592页。

失败为止。”^① 日军战略家石原莞尔说“绝对战争”，与其一脉相承。

日军饮鸩止渴，以战争助战争，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日军大规模向南方进攻，固然掳掠到大量的战略物资，控制了许多新的战略资源，但是新的战争却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新消耗。日军初战顺利，占领到许多战略要地，而新战场的开辟造成战线扩大，有新的地区需要保护或占领，致使兵力愈加不敷使用。通过总动员而仓促征调上阵的新兵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兵员素质显著降低。大量青壮劳力被驱赶上战场，造成国内生产停滞，经济衰退，国家力量下降。

日军幻想德、意在欧洲牵制英美诸
国，但德意在欧洲的战争自 1942 年即开始走下坡路。中途岛战后，作战部长田中新
一就曾写道：“德意败，日本危。对轴心国的战争合作，要确立对策。”同年 11 月盟军在北非登陆。翌年 2 月德军斯大林格勒会战惨败，残部投降，精锐被歼灭 33 万余人。2 月 5 日意大利改组政府，墨索里尼兼任外长，加强独裁。但不到半年，意大利法西斯大议会又通过议会推
倒墨索里尼政府，由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下令解除墨一切职务并将其逮捕，由原陆军元帅包多利奥出任首相，着手铲除法西斯党，宣布全国戒严，9 月正式投降联合国军队。其后墨索里尼虽被德军救出，德军进入意大利，但意大利已完全无力支持轴心国的战争。法西斯在国际上遭受严重挫败，对日本的扩张带来了沉重冲击。



图 43 日本战争经济
濒临崩溃，收集国内
寺庙的大钟熔铸炮弹

日本对于海上即太平洋方面的作战同样是强调攻势作战的。在太平洋初战胜利时期，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就曾强调：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3，第 1163 页。

“作为联合舰队之司令官,不能采取长期持久之守势。海军需要采取攻势予敌沉重打击。敌军备力量为我之5~10倍,如不对之各个击破,将何以进行长期战?!必须经常猛烈攻击敌之弱点,否则无以维持不败态势。”^①山本还认为,在消灭英美舰队,取得经由印度洋等地与德国自由通航态势之前,作战一步也不能放松。但是,日军这一攻势战略遭受惨败,中途岛一战日军损失大型航母4艘、重巡1艘,重伤重巡、轻巡各1艘,从此失去了大规模对美攻势作战的机动力量。决战战略完全失败,迫使日军统帅部考虑回避新的决战,实行持久防卫战略。

但日军对战争发展进程又一次估计错误,认为中途岛战后,美军有可能转入对日反攻,但这一反攻不会早于1943年夏季出现。没料到美军却在中途岛战后仅两个月,即展开攻势,于8月7日对南太平洋战略要地瓜达长纳尔发动进攻,完全打乱了日军战略部署。在长达半年的瓜岛之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地面部队3.5万余人,被歼灭2.4万余人。由于中途岛战后日军失去制海权,海上交通线被美军控制,岛上日军弹尽粮绝,同年底决定放弃瓜岛作战。翌年2月,用一周的时间,将残剩岛上的1万余陆海军人分批撤退。瓜岛之战使日本海空力量再度消耗巨大,更深地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局面。美军夺得瓜岛,使之作为西南太平洋方面的作战基地,对日军造成巨大威胁。4月1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在布干维尔岛上空连同其随从为瓜岛机场起飞的美军飞机所拦截,山本被击毙。在北太平洋日军被迫作战略收缩,5月30日阿图被美军攻占,日本决定停止在阿留申群岛方向作战,弃守基斯卡岛。整个北太平洋防线被压缩到了千岛群岛一线。在东南亚战场,英印军队于1942年底对缅甸西部重要海港阿恰布发动进攻,又由温盖特准将率领特种部队在缅甸中部地区展开游击战,迫使日军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634页。

投入大量作战部队进行作战,进一步遭受巨大损耗。

在这政治、军事处于全面颓势的情况下,日军统帅部重新分析形势作出决策。1943年4月20日,参谋总长杉山得到如下报告:“敌人反攻的威力及速度大大超过我之预料。南太平洋方面的作战目的,由于空中形势变化,特别是后方的补给问题,已不可能实现。……必须抛开以前的观念,预见战争全局的将来,希望断然进行战略转变。”^①其后杉山表示:“自开始就是勉强发动的战争,



图44 战争气氛笼罩全国,小学生也要练习喊“杀”

争,无论是第一线还是国内,可以说弓弦正在绷紧,因此恐不能轻易撤退。然而船只逐渐枯竭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无论如何努力,现有战线也恐将不保。”要求在前方作战之同时,“迅速向后方重要战线部署兵力和储运物资,准备日后之总反击。”^②9月25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正式制定《今后应采取之战争指导大纲》,终于决定要采取守势战略,并划出了一条日本务须确保的防守界线。

其决定的方针主要是:“帝国于今明年内以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之攻势,并迅速确立必胜的战略态势。同时急速加强决战力量,特别是航空战力,主动地进行对美英战争。”

规定其要领为:“排除万难,大致以昭和19年(1944)中期为目标,继续确立对付美英进攻之战略态势,随时捕捉及摧毁敌之反攻战力。”

该纲领规定的对中国战略,亦显然被迫采取守势:“对重庆继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7,第139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7,第142页。

续施加强大压力,特别是遏止从中国大陆起飞对我本土的空袭与对海上交通的破坏。同时,伺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日本划出了一条必须在守势条件下加以确保的海上“绝对国防圈”,其范围是:“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的范围。”^① 如果对比太平洋开战时,日军所确定作战计划的目标与语调,变化何其太大。当然日军在大陆和海上的防卫线虽是被迫划出,也同样是守不住的。

中止大陆西进战略与四川作战计划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迫转入守势,却试图对大陆西南地区强行展开攻势,即实行东守西进战略,以改变战略态势。西进的目标包括印度等地,但主要是以四川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地区。早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即企图乘势对华采取积极作战行动,认为:“切断滇缅路线之效果,预料于切断数个月后,其影响可迅速达及于全中国。故认为选定此一时期进行积极策动为有利。”^② 策划于同时进行“稍大规模的作战”,即长沙、常德作战与西安作战,并准备在此基础上进攻重庆。攻占重庆是日军认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侵华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说:“在适当时候进行重庆作战。中国派遣军的终极任务是断然进攻重庆,迫蒋政权屈服。”^③ 而对南方初战胜利,也导致对重庆作战论迅速抬头。一方面,征服中国是日本对外战争之核心目的,日军认为只有征服中国,才能“解决”印度问题,“解决”南方问题与“解决”苏联问题,并强调对于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来说“只有在1942年解决对华问题,才是此项战争计划成败的关键”。^④ 另一方面是安排作战的时机问题,日军在3月的一份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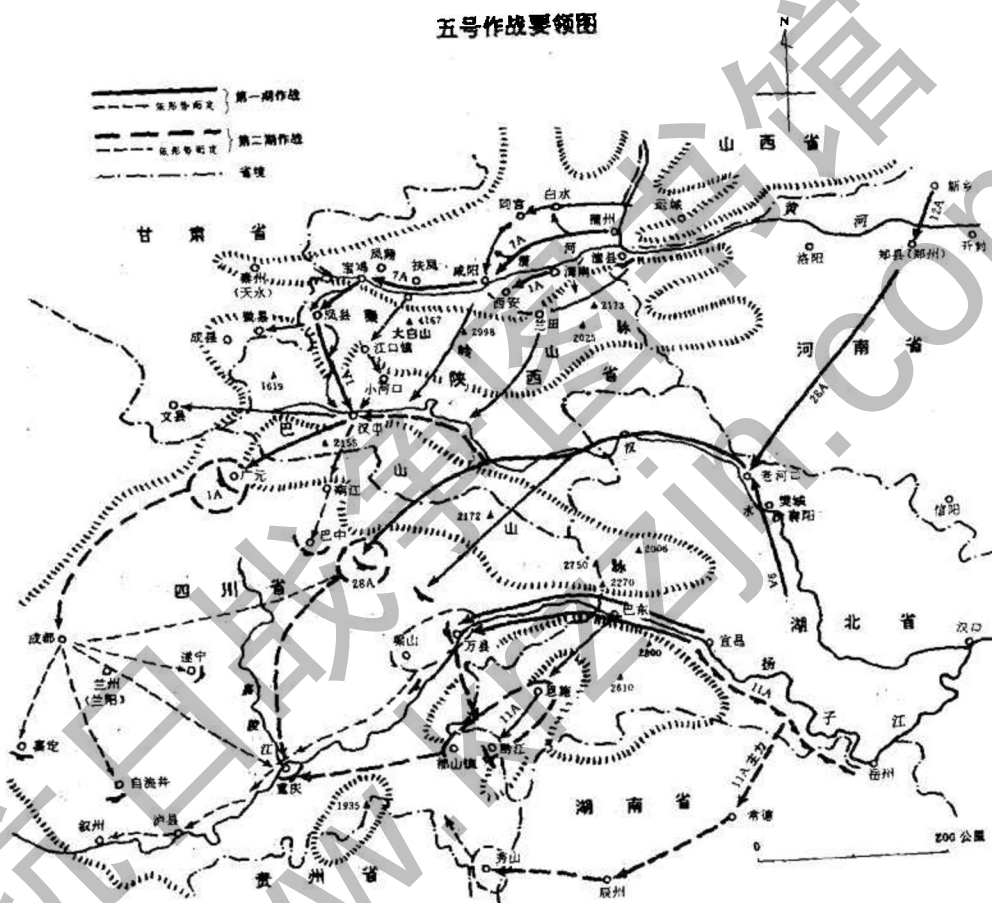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7,第185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527页。

③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596页。

④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635页。

五号作战要领图



案中决定：“加强对重庆的战略进攻态势，……以今年夏秋为目标予以推进。”4月的另一策案又提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后现在的事态，乃中国事变发生以来所未尝有过的处理对华问题的绝好机会。”^①重新筹划进攻重庆，构成了日军西进战略的核心内容。

但是从根本上看，日军对于进攻四川并没有必胜的信心。鉴于国民政府坚决抗战，在战略与经济等方面又有四川的特殊地理条件，故日军大本营也认为：“不能期待蒋政权的急速屈服。”而最为主张进攻四川的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淳也表示：“关于四川作战我一向是主张的，但研究后知道，需要同时使用伞兵部队。如不先占成都、然后东向进攻重庆，则即使进行四川作战，对解决事变也不会有多大效果。”^②在作战目的方面，也停留于泛泛而论，在3月议决的《今后应采取之战争指导大纲》中规定：“作战目的在于歼灭敌之中央军，或攻占对重庆政权能构成直接威胁的战略要地，或策划使敌军各部分崩离析而使重庆政权愈加丧失统制力。”等等。^③

对四川作战尚未形成定案，太平洋战场形势已经恶化。日军对四川作战又提出了新的目的和要求：“以对美作战促进解决战争，确认暂无成功希望。莫如以对中国作战打开出路”，也就是“依靠对重庆、成都的军事进攻，或从大局着眼的日中和平方略。”^④根据这一构想，日军统帅部要求立即实施对西安作战，然后对重庆进行最后的攻击。6月19日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曾通知中国派遣军于10月中旬发动这一作战，其后陆军部又决定将西安、重庆两作战连续进行，时间初定于1943年春。方案为：中国派遣军以主力从西安方面，另以一部从武汉方面发动进攻，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并占领四川省，以最小限度的兵力确保现占领区安定。日军称此方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594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599~601页。

③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527页。

④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4,第217页。

案为“51号作战”。计划投入担任进攻的部队为16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两个飞行师团，规模超过太平洋开战时投入的兵力。另部署15个师团、14个混成旅团担任守备，总计投入约40个师团。7月中旬，参谋本部作战部决定实施上述方案。海军方面因中途岛战败，短期内无法扭转海上态势，也一反过去的消极态度，支持对重庆作战，力争先解决西方战线问题。

当对四川作战就要正式出笼之际，日军最高统帅部再度陷入犹豫。东条首相兼陆相担心，集中日本最大兵力“一头冲入中国”，对英美作战及对苏战备都将受到影响。且德苏战争局势如何发展，都是未知数。制定该作战计划的作战部长田中也写道：“资材方面的困难，姑且不论。陆军省对重庆作战从政略的大局观察，并无十分把握。此外，海军方面对重庆作战抱不反对态度的未必是多数。因此实施重庆作战的前途，决非易事。”^①而田中之所以仍然主张对四川作战，是认为：“虽有许多困难，但应考虑如不实行则战争形势将如何发展？……无论如何也要实施5号（对四川）作战。”^②关东军方面则表示反对：“即使在中国展开大规模作战，其结果也将一如既往，只能在点与线上作战，很难使蒋政权屈服。而且进攻的地区与现有占领区相比，又未必是生产发达地区。”^③

日军内部各种讨论，经东条于8月15日裁决，决定于1943年2月前后发动对四川的“51号”作战，同时还准备由南方军进行对印度东北部进攻，占领阿萨姆邦和吉大港，目的之一是“切断援蒋航空路线”。8月25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根据目前形势陆军的作战准备》，规定日本战略方针“在太平洋方向加强防守南方现有占领地域，遏制敌反攻企图”，也就是在太平洋方向暂取守势，另在印

①（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4，第373～374页。

②（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5，第66页。

③（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4，第570页。

度洋海域及中国、印度等方面采取攻势。“实施逐次占领印度大陆要地的作战”，目的是“为了切断对华空中通道”。中国“按目前形势发展，不能期待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但是“如严重打击重庆政权抗战重要支柱的中央军，进攻其保有整个军需生产约二分之一，最大物资补充来源地，而且建有美英空军基地的四川，摧毁重庆政权的根据地并予以占领，则有极大可能使蒋屈服。即使蒋政权不屈服，也将名存实亡，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①又决定将原51号作战代号改称为5号作战。9月4日，日军统帅部以大陆指第1252号指示命令准备实施对四川的5号作战。至此，日军决定的东守西进战略大体确立。

从上述可见，日军的西进即进攻四川战略的确立，是战争受挫的产物，是以攻助守。所以，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9月6日得到报告后，在日记中写道：决心通过进攻四川作战打开局面，完全是孤注一掷的行动。在同美国作战中，虽不允许将宝贵的军需物资用来进攻重庆，但作为穷极之策，陆军省也同意了参谋本部的意见，只是对10月下旬是否实施仍保留意见。目前实施作战的可能性只有50%。在9月9日召集部下的会议上，这位总司令领头高呼：“为了我军的荣誉，我号召全军进行殊死的战斗。”^②骄兵变成了哀兵，蛮干拼赌的情况灼然分明。

尽管如此，日军的西进战略仍不能实施。瓜岛之战比日军预料的来得早，败得快，东线防守失利，物资消耗巨大。畑俊六日记中曾记述，大陆日军向海军通融飞机汽油，却因海军自身难保，终被拒绝。面临重重的困难与危机，9月19日大本营首先指示限制印度方面的第21号作战，据9月25日《大本营机密战争日志》记录：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4，第555～556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5，第78页。

“目前对印除静观外别无他策。”^①同时大本营于9月22日通知中国派遣军“5号作战不得不延期”。^②日军准备考虑放弃对包括印度和中国西南在内的整个西进计划。

11月上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经多次讨论,作出世界形势判断,其中对重庆政府的估计是:“(一)人的资源丰富。(二)财政经济虽极穷困,但粮食及轻武器均可自给,因此不能期待其抗战态势很快发生破绽。(三)军队、陆上部队约300个师,航空部队约有飞机100架,虽装备不良,但不妨碍消极战斗。在华美航空部队约有飞机70架,并在逐步增加中。(四)蒋介石地位仍然巩固,其统帅力尚未削弱。”^③日军统帅部还同派遣军联合研讨对华作战,而派遣军没有把握实施5号作战,却另提打通粤汉及平汉路作战,这一提案形成后来1号作战基础。鉴于实际态势,参谋本部由11月7日通知派遣军参谋部:“关于5号作战问题做了多种研究之后,鉴于全面情况的变化,尤其是有关船舶及国家物资动员(预计可得到的军需品数量急减)关系,判断在1943年实施此作战至为困难,此问题当于最近决定后另行指示。”^④实质是准备取消该作战。12月10日陆军参谋总长提出中止该作战准备,以免消耗战略物资,促成最后决定。大本营以大陆指第1367号命令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决定中止”5号作战。畑俊六在12月13日记述:“总之由于明年全年对中国方面不能补充兵力和资材,因此中央希望明年进攻作战一律停止,其他作战在明年夏初对南方作出推断前暂时停止。”^⑤

日军动议的西进战略,包括筹划已久的进攻四川作战,完全夭折了。其后在更为恶化的战局中,日军统帅部还有人包括后任派遣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5,第174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5,第185页。

③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5,第292页。

④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5,第423页。

⑤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5,第580页。

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都建议过实施四川作战,但再也没有形成过上述那样正规的决策案,当然也没能得到实施。对日军强硬派来说成了一种难受或遗憾,如畑俊六说:“形势如此剧变,极不愉快,但全面情况所致,别无良策。”^①

2. 最高统帅部的混乱与更迭

东条独裁回天无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条曾竭力强化总体战体制,对内阁等国家机构进行了“恣意的改动”。1942年11月1日新设大东亚省,合并了内阁的拓务省、兴亚院及对满事务局等机构,接收了外务省部分权力。一年后又新设运输通讯省、军需省和农商省,废铁路省、邮递省、农林省、商工省及内阁企画院等。其中军需省官职定员1066人,临时职员2400人,成为内阁中最庞大的省,下设总动员局、航空兵器总局、机械局,钢铁、轻金属、化学、电力等局,控制了所有的工业生产领域,由东条兼任军需相,大批现役军官担任省内要职。此外对内阁所属各院厅机构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调整过程中,东条除兼任陆相、军需省相之外,还先后兼任外相、内务相、文部相、商工相等职,为日本内阁史上兼职最多的一位首相,被称为“东条独裁”。陆军方面曾有人推荐已退出现役的石原莞尔出任参谋本部次长等日军统帅部要职,以推进其东亚联盟主张,加强对华政略,但因为东条与石原间关系恶化等因素,未能实现。可见东条权势之盛。

解决战争物资供应,是东条内阁最为头痛也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1943年3月,以内阁名义制定《行政检察规程》,强化对国家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5,第580页。

各行政机关及各工厂矿山的监督,以推动战时经济的营运。又炮制《内阁顾问临时设制》,顾问成员包括日铁社长丰田贞次郎、日本银行总裁结成丰太郎等所谓既有财力、又有经验能力的大财阀7人。顾问协助首相行使行政指示权。设置“战时经济协议会”,由上述顾问及首相指定的大臣组成,首相任会长,协调军民财政等多方面关系,制定措施以推进战时经济生产。在设置上述管理机构的同时,又从法律关系入手,颁《战时行政特例法》,授权首相以监督、命令、处置等手段,对于钢铁、煤炭、轻金属、船舶、飞机等五大产业实施直接管理。总之“是考虑由国家行政对其战时生产加以强有力的统制与推进”。^① 同期又制定《增强军事力量的整备企业基本纲要》及《企业整备资金积累法纲要》,以最大限度地刺激生产,保证战时财政经济的顺利运转。

地方行政管理,根据同年6月28日制定的《关于刷新并加强地方行政方案》,划全国为9个地区,设置地方行政协议会长官,负责地方行政的综合联络和调整,以加强对地方政治经济的控制。由于战争导致人力物力的空前消耗,同年6月内阁制定《增产粮食应急对策纲要》、《战时衣着简朴化实施纲要》、《确立战时动员学生体制纲要》等,直接克扣民众的吃饭穿衣,罗掘国民财富应付战争。在政治团体方面,在近卫的大政翼赞体制基础上,于1942年成立翼赞政治会,将残存的社团,包括支持军部的右翼团体东方会(中野正刚)、建国会(赤尾敏)、大日本党(佐佐井一晃)、大日本生产党(吉田益三)、东亚联盟协会(木村武雄)等全部加以解散。将各种行业报国会分类对口,置于厚生、商工、文部、内务、陆海军等行政当局的统辖之下。东条以内相名义颁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强化言论控制,扩充宪兵权力,对各种反战言论严加取缔,动辄加以逮捕,以统一“举国的政治力”。东条还加强宪兵恐怖统

^① 林茂等:《日本内阁史录》4,第345页。

治,在其下台前的两旬时间内,“用于所谓稳定政权工作的机密费约百万円……合现在金额约三亿円。如此巨额的国家费用,仅十余日间就为了自己的政权能够存续而花光了”。^①

东条上述各项措施,在当时即被日本朝野称为“总理独裁主义”、“独裁控制”。东条这一独裁政治的建立,打破了由明治宪政所确定的“首相为同僚中的首席大臣”的基本格局,使日本的法西斯专政达到空前高度。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固然充实了日军的作战力量,但已经无法扭转双方态势对比。据日方统计,美国在1942年至1943年间投入新造航母16艘,而日本同期新造的一艘也没有,1943年后半年日本改装了4艘,到1944年3月才新造出1艘。^②飞机生产1943年达于高峰,但只及计划要求的5万架的一半多一点,其后便因原材料及劳力不足急剧下降。日本在华北、华东等占领区的物资掠夺,也因形势濒临崩溃而剧减。

整个战局,特别是太平洋战场局势更加恶化。1943年11月由海军司令尼米兹指挥的美军在中太平洋发动大规模攻势,先后攻占了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等岛屿,还连续轰炸特鲁克岛和马里亚纳等地。在南太平洋地区,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军采用“蛙跳战法”,向西挺进。两路美军的攻势锐不可挡,直指日本绝对国防圈的核心区域。按日军的防卫战略,吉尔伯特群岛与马绍尔群岛为其前卫支撑点,特鲁克岛长期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部及海面主力部队驻在地。美军空袭使特鲁克岛停泊的舰船及地面设施遭受严重损失。面对空前严重的战局,日军统帅部内大多失去信心。1944年2月18日,佐藤军务局长就战区形势向东条首相进言:“放弃马里亚纳、加罗林等地,撤至菲律宾,在菲律宾一线进行最后决战。”同时

① (日)《日本内阁史录》4,第370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7,第430、440、607页。

建议,不要固执于条件,只要不是投降,能“在保持名誉的条件下讲和”即可。但东条严令:“和平攻势之类,一概不要再提。”^① 顽固坚持将战争进行到底。

东条内阁为坚持战争,特别是为解决船舶等作战物资,竭力实行更高度集权,进行了所谓“内阁改造”。在特鲁克岛遭受空袭后的2月19日,东条更换了藏相、农商相和运输通信相,三天后再度变更人事。此外,还进行了被称为“近似于政变的超乎寻常的人事变动”,即改变明治宪政所规定的军政与军令分离的“传统铁则”,将军令大权合并于军政大臣。由陆军大臣兼任参谋总长,由海军大臣兼任军令部长。为协助统帅,陆海军均实行两次长制,其中一名可以为大将级的大次长,另一名为中将级次长。东条认为只有最大地集权,才能协调军权的运行,在“如此紧迫的时候”,特别是因“马绍尔、特鲁克群岛方面的情形一刻也不能犹豫”的情况下应如此办理。^②

东条此举必然要招致许多人反对,首先是天皇提出对于统帅权的确立有无影响的疑问,被逼交权的杉山元参谋总长说:“统帅与政务不能混同,我不同意。”于是东条召开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等陆军三巨头会议进行讨论。杉山在会上再度反对,教育总监山田乙三也说统帅、军政分开是历来传统。但东条意愿坚决,二人抗拗不过,被迫以“大东亚战争中的特例只限于此次,作为非常措施”为前提予以同意。经天皇“御批”后于2月21日正式下令,东条以陆相身份兼任参谋总长,海相岛田兼任军令总长。东条在答复部分贵族院议员的质询时说:“我也认为是违宪的,实在因为作战上的必要不得已而为之,……毁誉褒贬任后世史家评说。”^③ 从此东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8,第93页。

② (日)《日本内阁史录》4,第367页。

③ (日)《日本内阁史录》4,第368页。

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集权登峰造极。

尽管东条采取集权之术，但仍无回天之力。在中国日占区，八路军开始春季反攻，并持续全年进行反攻作战。正面战场的滇缅作战日军也遭受挫败。在太平洋战场，消耗更为巨大，1944年2月，日军在腊包尔地区损失陆海军13万人，舰艇70艘（21万吨）、船只115艘（约38万吨），飞机约8000架。^①6月，日军拼凑剩余海空力量，短暂休整后发动对美军的“阿”号决战，双方在马里亚纳海面进行了战史上空前规模的航母舰队决战。日军惨败，4艘重伤、3艘沉没，飞机被击落400架，几乎丧失了全部舰载飞机。^②海空力量从此一蹶不振。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也在6月至7月相继失守。日本的国防圈终于完全崩溃。据东条身边随从介绍：“这一两天首相的脸色是世人所难以想象那般铁青，一副意气消沉的样子。”东条虽不愿意让出政权，却也不得不被迫表示：“因为失去了自信，如有合适的人选我愿辞职。”^③

日军泥潭换马

战局持续恶化，反东条的势力高涨起来，东条虽意气沮丧，口头上说辞职，但试图玩弄权术，继续把住权位。东条接受宫内省木户的建议，将兼任近半年的总长职让出，由梅津美治郎大将接任，试图平息反对意见，同意更换被视为东条心腹的海相，以满足海军方面要求。同时，延揽重臣（具有担任过首相资历者）入阁，以争取人望，重新组成“举国一致”内阁。但是反对东条的力量还在继续发展，重臣间要求打倒东条的意见统一起来，一致地拒绝了东条的入阁邀请。7月17日，7名重臣在平沼家聚会，会商的结论是由东条继续执政而“改组内阁，对前途多难的时局毫无裨益。必须建成一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3，第927页。

② （日）《日本内阁史录》4，第369页。

③ （日）《日本内阁史录》4，第369页。

个能掌握人心,打开当前局面的举国一致的强有力的内阁”。^① 彻底否认了东条改组和修补内阁的主张,要求东条下台,重建内阁。18日由内府转奏天皇。东条上台本来是由木户举荐的,而木户现在也倾向于重臣们的意见。东条在18日晨得知重臣们的会商结果,只好下定决心总辞职。于是经重臣会议推荐,组成由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和前首相、海军大将米内光政联合内阁,7月22日小矶内阁正式成立。东条还想继续担任陆相,保持一点最后的权力,为陆军方面三长官会议否定,杉山元出任陆相,东条退出现役。专横一时的战争内阁——东条内阁终于在战争泥潭中被替换下来,退出了历史舞台。

小矶内阁上台,需要立即拿出新的战争指导方案,来代替已被战争粉碎了的原有方案。但战局是如此糟糕,致使日军统帅部无所适从。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中,拿不出新内阁的施政纲领及战争指导方案,致使国家战略处于“一片空白”。^② 小矶内阁讨论的初案是7月27日由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战争指导设想》。该设想提出:“目前主要敌人美国,正乘其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时机,倾注全力,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继续对我加强决战性攻势。今年夏秋左右,战局和政局变化将更加严重,势将面临决定这场战争命运的关头。”还指出日本国力及物资生产“在今年之内,由于缩小了作战范围,还勉强可以维持作战的最低需要,但到明年以后,就再也不能指望了”。^③ 根据这种形势,今后的战争指导围绕着以积极决战还是以防御为主的长期持久作战而提出了4种方案:第一,今年后期倾注全部国力和军事力量投入对美决战,对明年之后的对策完全不予以考虑(即短期决战方案)。第二,今年后期投入国力和战斗力主要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3,第1022页。

②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3,第1121页。

③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3,第1124页。

部分(七——八成)对主要敌人美国的进攻展开决战,另以一部分(二——三成)准备长期作战(以决战为重点的两手准备案)。第三,今年后期使用过去那种程度的力量进行决战,同时进行长期作战准备(同时并重的两手方案)。第四,战局前途没有短期决胜的希望,以决战为辅,以长期战为主(即以长期战争为重点的两手方案)。在上述4个方案中,第一案为孤注一掷、为力量所不许,最后的长期战亦需要确保中部国防圈,所以根据日本国力只能选择第二案,即七分决战、三分持久战方案。

小矶内阁对上述方案选择迟迟不能实施。国内政治中的行政危机又摆在面前,首先是军政与军令权关系协调问题。小矶无法采用东条以首相兼陆相、又以陆相兼任参谋总长的集权办法,而有人建议合并陆海军以成立国防省的方案也无法实施。故小矶最后提议设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此案于8月4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正式通过。规定其宗旨是:“负责制定战争指导根本方针,掌握政略与战略之协调。”会议组成成员有陆军的参谋总长与陆军大臣、海军的军令部长和海军大臣及政府首相及外相。另外“根据需要可令其他国务大臣、参谋次长、军令部次长等列席会议”。会议设干事,由内阁书记长官及陆海军省两军务局长充任,等。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之后,8月19日召开有天皇出席的第一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了战争形势,会上根据上述陆军提出的设想案制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草案》。会议对整个战争前景十分悲观:“敌方想乘握有战争主动权之机,倾注全力,在政治、军事两方面,继续积极地加强决战性攻势,今年夏秋以后战局政局的发展将愈加严重。”对中国战局同样感到悲观:“重庆将积极努力继续抗战,特别是企图保持华南方面的空军基地,阻止我军向其内地进攻,同时顽强地继续进行打通中印公路的战斗。今后随着战斗力的

恢复和增大,必将进行反攻。”^① 会议决定继续坚持既定的战争立场:“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规定今后的战争指导原则:“在太平洋方面,消灭向我进攻的美军主力;固守南方各重要地区,排除万难,保护我国防圈内的海上交通;印度洋方面基本上维持现状。”强调:“对重庆迅速开展有组织的政治工作,谋求解决中国问题。”^②

梅津参谋总长还在会上代表陆海军两统帅部对日军战略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帝国为了今后的战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确保以帝国本土为中心的核心圈,以资源地带为中心的南方圈,以及连接这两方面的重要地区,坚决进行有组织的战争,为挫败敌人而奋斗。”对中国的战略为:“一、继续推进现正进行的对中国西南部分的进攻作战。大致在今年年底以前,消灭敌军在这方面的主要空军基地,极力扼制敌军空袭我本土的企图,并对重庆加强压力。二、占领浙东沿岸的重要地点,事先封锁中美间的联系,同时保障我本土与南方圈的联系。”^③

会议特别强调要提高日本的战争经济能力,强调在对华战争中立建立日满华体制的重要意义,战争指导大纲要求:“努力促成在日满华地区及南方地区的自活自战态势,为此首先应重视开发日满华。”^④ 在海上交通线被切断、船舶严重缺乏情况下,整顿大陆运输,掠夺大陆物资,成了维持日军作战力的基本条件。

自东条内阁垮台后的日本军政当局,根据这一会议确定的方针展开其政略与战略。日军在菲律宾集中力量进行“捷号”作战,又在缅甸方面拼凑仅有力量进攻英军在印重要基地英帕尔。结果在菲律宾的莱特大战中日军惨败,美军完全控制了菲律宾及其周边的海空权。在英帕尔的命运相同,缅甸局势迅速崩溃,中国远征军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9,第78~80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9,第91页。

③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9,第88~89页。

④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9,第91页。

开始收复北缅。日军企图整顿大陆交通线的企图也未能成功。到1945年初,日军大本营对形势的判断已经完全绝望:“一、敌方今后将迅速地直接加重对日、满、华核心地区的军事压力,南方各地区及太平洋上残存的据点将完全陷于孤立。二、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即便竭尽所有努力,大概也只能以昭和20(1945)年中期为限,此后作战方式及战争指导恐将不得不迅速转为游击战。……五、日本指望美、英、苏、重庆在目前的战争合作中发生裂痕,这在当前看来是不可能的。”……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现在想用外交手段来扭转世界形势,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①终于被迫承认战争已经失败。

小矶内阁在失败的绝望中还试图作最后的挣扎,由于对大本营的作战指导不满,小矶提出兼任陆军大臣职,使首相能直接干预军事统帅问题,遭到陆军拒绝。3月积极支持所谓缪斌工作以诱和重庆,又遭受失败。在各种失败面前,小矶内阁无计可施,遂于4月5日总辞职。重臣集团和宫内省等权力机构方面早就看出小矶内阁无济于事,几乎在小矶辞职同时,便作出了更换内阁的安排,决定由枢密院议长、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组阁。铃木内阁成了日本收拾战争败局的最后一任战时内阁,这也是日本军政当局在战争泥潭中最后一次换马。

3. 大陆战略完全崩溃

赌博性的最后决战

西进四川的战略被迫放弃,日军仍竭尽全力在中国的大西南方向寻找战争出路。1943年8月,参谋本部作战机构制定草案,准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第1296~1297页。

备在太平洋战局恶化的情况下,打通大陆南北地区,使日本控制的朝鲜及中国占领区与南方交通线完全连结起来。11月参谋总长杉山元正式提出进行打通粤汉线作战。为作好准备,12月下旬进行“虎”号图上演习,拟定有4个方面的作战目的:第一,夺取今后势将成为美机B-29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桂林、柳州,以保证本土防空万无一失。第二,通过占据桂林、柳州一带,以应付将来敌军经由印度、缅甸、云南指向华南方面的进攻。第三,在海上交通日益不稳的情况下,修复这些贯通南北的铁路,以开辟经过法属印度支那与南方军的联络。第四,通过摧毁重庆军的骨干力量和所取得的综合战果,以促进重庆政权的衰亡。^①其后,根据兵力状况和战场形势,对作战目的又修改缩小,只突出强调要消灭中国的航空基地的重要性。1944年1月24日,军部经修改后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代号为1号作战,该次作战目的为:“击破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南部平汉铁路沿线要域,摧毁敌空军主要基地,遏止其窜扰。”^②

经修改后的1号作战即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其目的已大为缩减集中于日本本土防空,从而使其性质成为本土防御之一部分。日本战略家堀场一雄评论说:“其性质作为太平洋战局的附带作战,同昭和15年底(1940)派遣军当局所提议的,为压服内地而进行的打通作战方案相比,其宗旨全然各异。”^③

为了确保以优势兵力作战,日军停止原计划调第三、第十三师团使用于南方的决定,将此两师团继续使用于该方向作战,并从关东军调入第二十七师团,先后新编14个独立步兵旅团和8个野战补充队及军直属部队、驻华派遣军所属航空部队第三飞行师团被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3,第1099~1100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8,第32页。

③ (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703页。

一号作战计划概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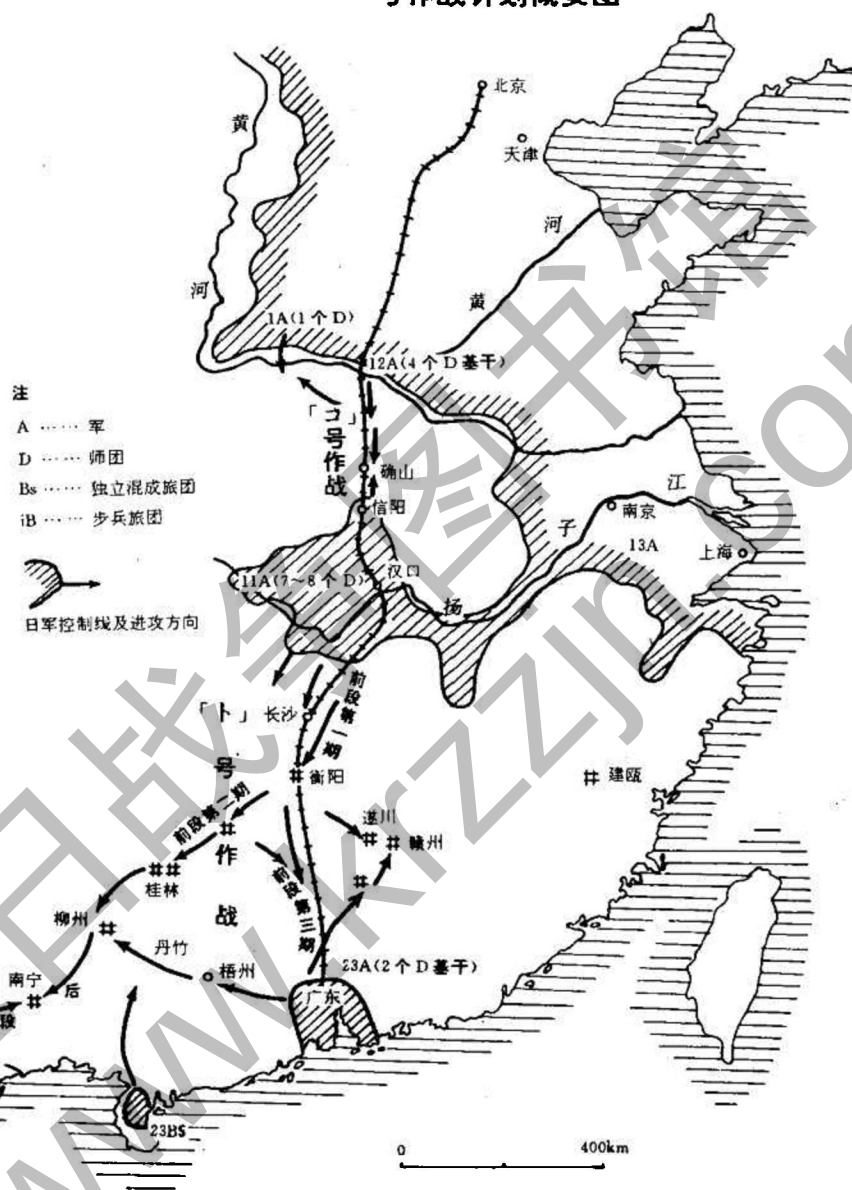


图 46

升编为第五航空军,总共投入兵力约 50 万人、马约 10 万匹、汽车 1500 辆、火炮 1500 门、飞机约 250 架,作战历时约 5 个月。南北战线约长 2000 公里,^① 为侵华战争以来最大规模一次作战。在中国方面,当时在编制上所有的兵力虽然很大,但能投入作战的不多,战斗力很弱,如驻河南暂编十五军“及其他新编之军队,缺额既多,装备尤劣,不惟缺乏特种部队,即步枪堪用者亦不足三分之一,番号虽多,战斗力实堪有限”。再如桂柳作战时守卫南宁等地的第九十七军,人数编制 1.3 万人,但战斗兵员不足 7000,参战人数仅 5000 人。^②

1 号作战共分三大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京汉作战”,正式发动于 4 月 17 日,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以第三十七、第一一〇、第六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等部渡过黄河,19 日占郑州,21 日占荥阳,接应黄河北岸的第二十七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等部渡过黄河铁桥南下。5 月 9 日西进洛阳,向中国军队第一战区主力突击。5 月 14 日占新安,18 日占陕县,20 日占卢氏。并于 19 日开始攻洛阳城,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激战 6 天,于 5 月 25 日失守。日军完成了河南作战计划,打通了平汉铁路南部。

6 月,日军实施第二阶段的对湖南作战。鉴于三次攻打长沙失败,日军此次集中了绝大兵力。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自南京进驻汉口,作战由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日军分两线进击,第一线以第四十、第一一六、第六十八、第三及第十三师团并列于华容、岳州南、崇阳一线约 100 余公里正面,分三路南向突击。为防止中国军队攻击侧翼,日军将精锐师团布置于外侧。第二线兵团由第五十八、第三十四、第二十七等 3 个师团随后跟进,除准备投入决战之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3,第 1101~1105 页。

② 转见张宪文等:《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 322 页。

外,还担负扫荡残敌及修补道路等任务。中国方面指挥官薛岳没能掌握日军调动情况,对其企图判断不明,还认为日军战法与前三次攻打长沙相同,故继续套用逐次抵抗、迂回侧翼战法进行抗击,未能挡住日军庞大的集团突击。日军于6月6日进至捞刀河一线,14日占浏阳,18日占长沙,22日占萍乡。湖南会战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中国军队保卫衡阳作战,中国守军第十军守城兵力共约1.7万余人,抗击了由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直接指挥的日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第五十八、第十三、第四十等师团的轮番冲击,8月8日城破,坚守长达48天,予日军以巨大杀伤。日军的湖南作战暂告一段落。

日军1号作战第三阶段为广西会战,又称为桂柳会战。日军攻占衡阳,补充休整后,于8月新设第六方面军司令部,隶属中国派遣军。调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担任司令官,指挥第十一、第二十三、第三十四军等部,兵力计有13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中国驻广西只张发奎第四战区所属约8个军12万人,不仅装备落后,连兵员也属于劣势。10月28日日军正式发动进攻,第十一军5个师团沿湘桂线南进,第二十三军由广州附近沿西江西进。中国军队第四战区曾策定在湘桂线方向逐次防守,迟滞日军攻势,而于西江方向采取攻势,各个击破来攻日军。对桂平方向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等部发动了进攻,但未能成功。11月11日日军占领桂林、柳州,24日占南宁,12月10日由越南北上的第二十一师团一部与自南宁南下的第三十七师团一部在绥禄(南宁西南约70公里)会师,打通了中越交通线。至此,日军1号作战结束。广西会战结束后,日军以其精锐第三、第十三师团等部冒险突进至贵州独山一线,旋被迫后撤。

日军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中国军事当局未能正确判断局势,期待于世界战局廓清,战略指导错误,各个战场各自为战。这诸多失误,使日军能逐次集中兵力,依次南

进,各个击破守军。其赌博性的决战终于能够获得成功,中国军队遭受了不应有的惨痛损失。

在大陆发动1号作战的同时,日军在菲律宾发动了对美反攻的捷1号作战。以菲律宾捷1号作战为主作战,大陆的1号作战为次作战。菲律宾作战以空海兵力为主,大陆则以陆军为主。两个方向作战相互支持,兵力使用上相互补充,同时并举。大陆1号作战获胜,部分改善了日军在整个战争中的困难处境,也刺激了日军内部强硬派的作战主张,进攻四川作战的呼声又高涨了一阵时间。

但是,日军1号作战的意义和作用十分有限。其动用的兵力比武汉会战还要庞大,为日军战史上“百年罕见的大远征”,但作战目的仅提及打通交通及加强本土防空,日军历来企求的“摧毁重庆政权抗战意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未再成为该次作战的追求目标。所以,这是日军发动最大规模的战役,也是最为消极的一次作战。

从作战结果或影响来看,该次作战被认为是在“战略上毫无意义的作战”:^①

第一,日军在大陆作战中消耗了庞大的兵力和作战物资,延迟了调兵南方军计划,削弱了南方军力量。其原计划调动的精锐第三、第十三师团盲目地冲入贵州独山,无果而退。同期,盟军在菲律宾等战场节节胜利,进逼日本本土。中国军队和英军合作,打通了中印公路,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与盟军在畹町举行了会师典礼。日军全盘战局更为恶化。

第二,日军抽调华北部队与作战物资南下,削弱了本来就漏洞百出的华北占领区防守。八路军自1944年持续发动春、夏、秋、冬各次攻势,日军被迫龟缩于更为有限的点线之内,其“安定”华北等占领区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发生动摇。

第三,日军集中近50万兵力在中国中南部地区作战,延长了

^① 桑田悦等:《简明日本战史》,第231页。

战线,消耗巨大,兵力愈感不足。而打通的交通线却经常被握有制空权的中美空军所截断。桂柳机场虽一度被日军占领,但中国幅员广大,还有可供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例如B-29轰炸机还可利用成都机场轰炸日本本土。所以,日军打通大陆线作战,劳师而无功。

第四,直接危害了后来的战略收缩,1945年初至春夏间,日军统帅部决定收缩在华日军,加强东南沿海对美军的防守,却因部署分散,未能及时实施。

综合上述原因,日军战史写道:“虽攻占了中国西南交通线方面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地打通了法属印度支那连结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将如何?”还说:“在策划1号作战当时所考虑的,要摧毁指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决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关于全盘1号作战,尤其是第2期的向桂柳地区挺进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是否适当,值得今后深思和检讨。”^①还有的日本史家评论道:“由于这次作战投入了主力,后方战线开始崩溃,在中国的日军丧失了优势。”^②所以日军所发动的赌博性的1号作战,加速了日军整个战略的崩溃,得不偿失。

两面战略与战略退缩

日军虽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整个中国战场形势对日军不利。国民政府着手制订反攻计划,准备首先在南方发动反攻,打通对外交通取得补充,再收复全国失地。远征军及驻印军等取得滇缅战场胜利后,开始转进东部正面战线。在日占区,自1943年后抗战力量

① (日)《战史丛书·广西作战》,第225页。

② 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3,商务印书馆,第108页。

重新恢复和发展,抗战根据地迅速扩大,到1945年初,中共领导的抗战根据地共19块,总人口约9000万,主力部队78万人,民兵200万人,^①且经过局部反攻的作战与训练,军政素质都有全面提高。日本扶植的汪精卫及各地方傀儡政权分崩离析,士气低下。汪精卫本人1944年底病死于日本。日军在大陆战场败局已经十分显明。

形势发展迫使日军统帅机构于1944年底制定了陆军省《以国力为基础的形势判断》、参谋本部《关于帝国应采取之战争指导的观察》、和《大概以昭和20年(1945)中期为目标帝国应采取之战争指导大纲》等文件。其中关于形势与战争指导方针方面强调:“今后国力、战力之估计是:业已临近遂行现代战争之极限。因此今后的战争指导应直视现实状况而慎重进行。综合各方面因素后,帝国‘在战略上应确保巩固的固守态势,战术上努力实施有限的集中攻击以摧毁敌之进攻力量。政略方面应强化和促进战略性固守圈内的自给自战施策,以坚忍不拔地确立遂行长期战争之态势,并继续努力解决对华、对苏问题’。所谓确保战略性固守态势即‘控制日满华要域并加以固守’。所谓战术所要求的集中攻击为‘限定在战略的守势之内特别是在海上摧毁敌军,应防止分散力量而集中于一点’。”该方案还认为:“在日满华的自给自战施策十分困难,要并行积极作战更不可能。因此,要收缩广阔战面上的分散作战而努力培养国家力量,集中精力于自给自战施策,必须确立能承受于长期战的态势。”^②这几个方案所形成的“收缩战面”避免分散作战,加强日满华范围即日本及中国占领区内的“自给自战”态势等原则,成为1945年战略崩溃时期的基本指导原则。

日军统帅部认为日本在军事上所受到的战略威胁来自两个方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2,第440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9,第513页。

向,一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特别是沿菲律宾、冲绳群岛对日本的进攻,再就是在中国大陆上所受到的各种攻击。在大陆战场,也包括在东南对抗美军登陆与在西南对付国民政府的两面作战问题。为调整部署特派出调查组到南京、汉口、上海等地考察战场实况,于1944年12月18日制定《关于加强台湾、中国东南沿海防御》草案,试图收缩大陆战面,强化大陆东南沿海及台湾沿海防御,同冲绳、菲律宾等西南太平洋海上防线相呼应。日军将一部分通讯部队编入第六方面军及第十三军序列,从第八飞行师团抽调两个独立飞行中队编入第五航空军序列,参谋总长对其任务指示为:“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协同海军保护海上交通线。”^①按日军参谋本部这一部署,是要加强东南沿海防御,而暂置广大内地于不顾,也就是大陆以东南为主、西南为从。中国派遣军对上述东主西从战略不以为然,强调:“一、再给重庆一次打击,必将使之崩溃。二、纵令同时出现中国东南沿海作战与本土作战状况,也不可能在中国东南决战,因而派遣军要专心于西进作战,以获取决定性的胜利战果。”^②坚持西进为主,反对将防卫重心置于东南。翌年1月,冈村进一步建议:“重庆已成为美国的傀儡,且在全面战局对轴心国不利的现状下,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单靠外交谋略手段。”^③

日军统帅部的在大陆上的东主西从战略同侵华日军司令部的西主东从战略发生冲突,大本营决定召回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中将到大本营协调意见。1月5日由松井代表派遣军建议:“判断美军进攻中国东南沿海将在本年中以后,要在其进攻之前进攻四川,摧毁重庆。”其理由是:(一)事前摧毁重庆的企图,以防本年中将出现两面作战的困境;(二)摧毁敌航空基地;(三)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结合研究今后缅甸方面军的作战变化,进而考虑将来打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9,第510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9,第509页。

③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0,第98页。

通大陆南方,有必要先在西部扩大地盘。参谋本部作战课对上述意见研究后于1月6日作出结论:“总司令官关于进攻四川的设想虽属可行,但鉴于帝国全面战略态势和国力现状,须全力对付主敌美国,不可能同时实施两面作战,故望派遣军首先专心于对美作战,加强中国东南方面的战备。”^① 据此由参谋总长与作战部长正式向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发出了指示。

经过上述协调,日军确定了在大陆中国以防备东南沿海为重点的东西两面作战方针,于1月22日正式下达命令:“加速强化中国大陆上的战略态势,击破从东西两正面来攻之敌,尤注意击破美军,以确保大陆上之国防要域。”强调“强化战备的重点应放在中国中南部,特别要保持扬子江下游要域”。对大陆作战范围作出规定:“连结大体上以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山西省西南端的黄河、老河口、宜昌、秀山、黎明关、平马一线,如果向以西地方实施作战应以小部队进行挺进奇袭作战等,依据另外命令。”^②

日军统帅部关于这时期两面战略的制定,是部分迁就了中国派遣军的意向之后作出的。而冈村宁次很不满意,企图在实行中变其大陆战略为东守西进战略。在29日各军司令官会议上,作了如下训话:

“本职决意在全军将士奋起之下,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圈内的宝库,在东方海岸要域布成铁桶般的阵地,当敌登陆时予以歼灭,在西方排除万难挺进深入重庆辖域,以摧毁敌之根据地。”^③ 并命令第六方面军加以研究并制定计划。而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对此作战没有信心,始终持消极态度,直到战败投降也未能提出最后策案。

日军协调制定的两面战略,未能约束大陆日军在西部大规模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0,第14页。

② (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705页。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521页。

用兵，冈村宁次决定对老河口、芷江两地发动进攻作战，作战目的是“摧毁敌前进航空基地”。对老河口作战自3月22日开始，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出动第一一〇、第一一五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等优势部队，另有荆门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向襄阳作牵制性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抗击，但因指挥失误，使日军曾一度攻占了老河口机场和市街。其后日军又被迫撤回。日军对芷江之战则遭受惨痛失败。自4月上旬开始，日军第六方面军以第二十军所属第一一六师团及第四十七、第三十四、第六十八师团各一部向湘西进击。由于中国军队坚决抗击，日军在雪峰山一线受阻，现地指挥官要求增兵2至3个师团，日军统帅部无力增兵。5月9日日军开始败退，中国军队展开攻击。日军在老河口、芷江两地作战伤亡达4万余人。日军战史认为，这两次作战特别是芷江作战，由于中国方面投入了经过整训的美械装备部队，使“敌军面目一新”。^①

日军上述老河口、芷江战役的发动，除明确规定的摧毁机场以强化本土防空等目标之外，包含有西进因素，是为冈村所安排的对四川作战的一个重要步骤，或一次尝试。两次作战特别是芷江战败，标明日军在大陆的力量早已成为强弩之末，同时，日军所企求的进攻四川的西进计划则被完全打破。

在芷江战败之际，4月，美军又攻入冲绳，踏上了日本本土门槛，迫使日军作新的战略收缩。大陆日军统帅部决定完全贯彻原定两面战略，以冲绳本土防卫为中心，大陆战线也要：“东主西从，沿海战备重点放在华中（东）、华北。”^② 继而准备战略撤退，放弃华南。将武汉以南兵力大部调往满洲，一部调回本土加强本土决战力量。首先决定将广州地区的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等师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第1361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0，第133页。

团北撤。4月18日下达北撤命令。

但是,日军的战略撤退究竟如何实施,收缩的范围如何,尤其是是否保留武汉,内部分歧甚大。参谋本部决定放弃武汉,而陆军省及派遣军最终还是决定:“确保上海、汉口附近甚妥。如果放弃该地区,实即败退,如收缩集中于华北,粮食自给则不可能。”^①6月4日,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大连召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两总司令讨论形势与任务,会议决定日本在中国关内地区作战方针如下:

“(一)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东)、华北要域,在对苏联、中国实行持久战之同时,歼灭来攻沿海要域的美军,以使日本本土决战顺利进行。

(二)对美战备重点,首先为华中(东)三角地带,其次为山东半岛,但应该注意破敌对华中、华北登陆企图,努力及时地将派遣军主要战斗力量集中于该地。

(三)在万不得已时,也必须确保南京及其周围,北京及其周围与武汉及其周围等要域。”^②

日军的战略收缩计划距其投降只两个多月时间,其各地驻军由于受中国军队的牵制围困,执行十分困难。日军的收缩撤退,恶化了本身的颓势,抗战力量加速了反攻。在华北、华东等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口号,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基础上于1945年再度发动攻势,收复了大片国土。日军企图确保之地,亦难于保持。特别是华北各地,形成溃败。国民政府军队也已着手收复两广等华南要地,5月27日中国军队攻占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桂林。但国民政府的反攻计划过于迂缓,直到日军提前投降,也未能制定更好的计划。由于国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0,第130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0,第295~296页。

民政府没能抓住时机转换战略,受消极的应战战略的影响,眼看着日军在溃败中仓促收缩和撤退,也未能给予应有的打击,夺取更多的战果。

日本6月8日举行御前会议,铃木首相及军部要员均无视崩溃局势,继续作困兽之斗,决定“坚决完成战争”,但大势铸就,败局难收。日军所制定的大陆防守计划,几经改动,最终还是留下了几页失败的纪录。

4. 停战指导与签字投降

停战指导与乞和谈判

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一个从征服走向失败的战争。因此,日军的开战与停战指导全程,是从征服、迫降、诱降、诱和、乞和直至投降的演变过程。在此不妨再作一简要的回顾。

日军自1931年的“九一八”开始发动战争、实施武力征服政策。到1937年战争升级,攻占中国首都南京,认为大功将成,遂于翌年1月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迫降。1938年秋武汉会战后,日军虽然攻占“九州通衢”的武汉,但战争遥遥无期,日本只好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改换态度,实施诱降。1938年底汪精卫投日,1940年建汪精卫南京政府,曾为日本的诱降政策带来一线希望,但中国军民坚持抗战,打破了日军的诱降企图。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中,却看到了在中国作战的希望渺茫,承认华南的中国军队战斗力并不低下,在华中地区中国军队“不可轻侮”。根据作战部长田中的记录,日军作战机构提出“以1942年冬作为转变时机,以解决日中问题为根本方针,过去的对华政策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必要”,强调:“对华和平几乎是绝对必要的,拘泥于过去的所谓权益云云,如

果大东亚战争失败,那就什么也存留不住了。”^① 决定与战争手段配合,加强诱和。同时制定新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强化汪伪政权,加强政略攻势。日军承认“扶植加强国民政府做为对华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在其日记中写道:“对内及对重庆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穷途之策,实行起来不会那样简单”,但却是打开对华困境,诱和国民政府的“仅有的最后一策”。^②

作战结果不出日军所料,1943年战局恶化,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自林南、卫南战役开始,发起连续的、日益增多的局部反攻。国民政府也调整和补充了军事力量,首先在滇缅方向配合英印军队展开反攻,而汪精卫及其他傀儡政权全面受挫,属下军心民心日益涣散。10月30日,日本与汪政权签订《日华同盟条约》,代替1940年的《日华基本条约》,试图以放弃关内占领区及原有特权为条件,继续对重庆国民政府实施诱和。

翌年7月,鉴于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均呈崩溃模样,东条内阁下台。新上台的小矶内阁面对一个烂摊子,束手无策,经过一个多月的政策“空白期”,才提出《对世界形势判断》和《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对重庆政府方面决定要“迅速发动统一领导的政治工作,竭力利用苏联以解决中国问题”。9月5日,又制定《关于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文件》,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姿态,配合正在进行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诱和与作战配合,以“创造彼我直接会谈机会”,让步条件是恢复到1932年前状态,即保留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为推行这一计划,已退役的宇垣一成大将受日本政府委托到中国活动,回国后曾提出建议:“重庆工作需要开辟新路线,南京政府的存在对工作反有妨碍。”其后汪精卫于11月10日在日本就医过程中死去,汪的死因同日军的对华谋略究竟是何关系,是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597页。

② (日)《战史丛书·华北的治安战》2,第299~301页。

否真为病死，至今是一桩分歧甚大的历史公案。日军的上述方案，在内部曾遭强烈反对，在实际上又是中国完全不会接受的行不通的方案。派遣军参谋副长今井武夫说：“中央并未深入考虑南京国民政府与重庆政府的关系，也未很好研究南京国民政府近一年来几乎完全失去信心而放弃努力的实际情况，即行作出如此决定。”^①年底，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自称同重庆政府有密切关系，愿意协调中日和谈，被邀到日本。日本因停战心切，于1945年3月21日召开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审议缪斌提出的“解散汪伪，日本立即撤兵”等条件。反复讨论，终因陆军方面反对未能形成决议，小矶随后下台。冈村宁次接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后，试图利用其与何应钦的同学关系联系和谈，还让降将孙良诚同冯玉祥联系，由冯玉祥促动蒋介石和谈。^②但蒋表示，无意对日进行和平谈判。^③冈村的乞和活动完全失败。

日本还试图打开与中共和谈的渠道。7月3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对中国作战时宣传要领》，规定“对中共本部暂称延安政权，对其所属军队，在需要讨伐时则以匪贼称之。对反共、剿共、灭共等名称，一般情况下应避免使用。中共的名称也尽量不用”。其原因是“作为对战争终局指导思想的一环，当时的设想是，为了与美国谈判，首先需要和苏联的莫洛托夫握手，而作为与莫洛托夫谈判的手段，就要考虑怀柔毛泽东”。^④

小矶内阁时期的日本对华政战略，同东条政权时一样遭受了全面失败。1945年4月7日，组成了铃木贯太郎内阁。铃木内阁决心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工作以求实现停战”。^⑤同

① (日)《战史丛书·华北的治安战》2，第527～528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57页。

③ (日)《战史丛书·华北的治安战》2，第528页。

④ (日)《战史丛书·华北的治安战》2，第524～525页。

⑤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4页。

期,日军在芷江等地作战失败,作战指挥机构于4月下旬起草《形势判断》,分析指出:“重庆在美国支援下坚决实行各方面改革,特别是一直谋求加强基本战力的美式化,并增加空军,策应美军作战,估计秋季后,很有可能实行对日军全面反攻。随着美苏的前进,预料大陆战线将面临严重局面。尤其延安方面对我占领地区的活动将日益激化。”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华谋略:“对中国政策的最根本方针,归根结底,似在促使日、苏、中在东亚的结合,以及离间美、英、苏、重庆、延安,助长其互相争执。”4月20日再度强调:“加强实行对重庆政治工作和对延安的谋略工作,努力实现与重庆停战。”迫切地表示对华乞和。上述报告的起草机构负责人种村佐孝大佐承认,要达成停战,兼顾方法与条件,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即使被指为对中国作战失败,也无可奈何。日军最高统帅部批准了这一指导方针,4月28日以“大陆指第2468号”作出指示,要求派遣军“以使重庆停止对日作战为重点,创造直接会谈机会,我将全面撤兵”。^①

日军的乞和谋略目标是体面的投降甚至体面的停战,保持在东北、台湾等地区的殖民统治,保存一定的军事力量,以便于在美、英等盟军的攻势之后再卷土重来。故此,日军的乞和活动被中国完全拒绝。5月20日的大陆联络会议上,日军派遣军参谋次长今井武夫承认对重庆、延安工作无进展。于是日军被迫作出决定,在完全崩溃的前夕收缩战线,下令迅速撤离湘桂、粤汉等沿线地区,将兵力集结于武汉及长江三角洲、华北等地区。在国内则动员“一亿玉碎”,实行本土决战,采取“肉弹特攻”战术对抗美军海空力量,企图在本土防御战中取得一定战果后再进行谈判交涉。为搜罗兵员,6月22日公布新的“义勇军兵役法”,实行国民皆兵,男子服役年龄为15~60周岁,女子17~40周岁。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0,第194~196页。

日军同国民政府的谈判曾在7月出现一点转机。其时蒋介石担心苏联进入中国东北,有损中国权益,遂训令何柱国等人设法接触日方人员,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等地撤兵,以取消苏联的出兵借口,作为回报,中国则不妨碍日本在中国之外的行动,同时声明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毁灭日本。何柱国为坚定的抗日爱国将领,未领会蒋之真意,在会谈中态度强硬,敦促日本从海外全部撤兵,包括朝鲜、库页岛南部等地均不能保留。今井一听有如五雷轰顶,退出了会谈。蒋闻讯后十分生气,试图另派人再开谈判,但战争尾声时机仓促,尚未及安排,苏已宣布出兵东北。

日军在乞和谈判上输得最多的是乞请苏联斡旋。由于苏日间缔结有中立条约,日本视苏联为斡旋和谈的靠山。5月15日,日本在其盟友、惨败中垂死的德国法西斯身上踩了一脚,宣布废除日本同德意之间的一切条约,以作取悦苏联的进见礼。随后派对苏外交经验最为丰富、任过首相的广田弘毅为代表,于6月3日在箱根找到为躲避空袭而疏散的苏驻日大使马立克,表示愿意对苏友好。6月24日广田再晤马立克,询问苏联意向。马立克回答广田提案太抽象,所以未向政府报告,要求日本开列条件,于是在6月28由外相东乡茂德草拟一份提案交广田,其要点为:日苏两国间缔结维护东亚和平、相互支持、两国互不侵犯之协定。日本让步条件:(一)满洲国“中立化”;(二)以供应石油为交换条件,放弃渔业权;(三)考虑苏联希望的其他条件。马立克答应转交,而广田催请再次会谈,马立克则以有病为托辞,避而不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亦同时在莫斯科展开活动,多次请求后于7月11日见到苏外长莫洛托夫,提出日本派出前首相近卫公爵为特使赴苏,并透露准备接受有条件投降,莫洛托夫回答必须研究后才能决定。拖延到7月20日,波茨坦会议已经开始,苏联副外长复函告诉日本:鉴于近卫特使的使命不明确,不能作出具体答复。而一周后,波茨坦公告正式公布,无疑给日本当头一记闷棍。但日本仍然心存幻想,外务省分析:“可以确

切肯定苏联领导人在波茨坦参加了这一公告的发布,而在公告中并未列名,看来似乎苏联现仍维持对于日本的法律上的中立。”^①还认为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条件较开罗会议宣言有所放宽,这有可能是苏联转告或参予的结果。因此,日本政府令佐藤再见苏联副外长洛佐夫斯基,希望苏联斡旋使日本避免无条件投降。副外长答应转告,但要等待外长莫洛托夫从柏林归来后再具体谈判。8月5日莫洛托夫同意于8月8日与日使见面会谈。到了8月8日,日本望穿秋水,终于见到了莫洛托夫,而莫洛托夫只告诉佐藤,苏联决定正式对日宣战。这就是日本乞请苏联斡旋之最后结果。

苏联拒绝斡旋并对日宣战的原因主要是:第一,盟军方面通过一系列会议,确定了统一的对日方针,苏联作为盟国方面一成员,不愿另行一套。第二,日苏外交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双方在远东方面一直进行着广泛的权益争夺,苏联不可能在日本侵略扩张失败之时为照顾日本利益而作出让步。第三,从历史因素看,日俄战争的战败,使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欲报一箭之仇。斯大林在对日宣战后的9月2日广播讲话中说:“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四十年。”^②第四,从现实利益看,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在没有中国代表参与的情况下,由美苏协议确定了战后远东权益分配与政治秩序,最大限度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如规定承认外蒙古独立,实质成为苏联的附属国,外蒙西北的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土地归属俄罗斯情况未作变动,苏联租用旅顺为军港,大连作为自由港,中东铁路由苏中共管,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交割苏联,等等。苏联所得已大于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第1630页。

②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38页。

日本允诺之让步。基于上述原因,苏联拒绝日本之请求,并对日宣战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日本对苏联的幻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实咎由自取。

日本作为一个侵略国家,不改变其侵略立场,不向受害国家作及时反省,仍企图最大限度地确保其侵略成果,既欲坚持战争方式顽抗到底,又慌不择路乞苏斡旋。在全局崩摧的形势下,拿不出有效可行的停战指导,致使外交碰壁,毁灭降临,最后仍只能作无条件投降。

日本决定投降

波茨坦公告宣布之后,日本所采取的对策是,由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批准外务省的建议:“首先,为给今后和平谈判留下后步,对三国公告不予拒绝是必要的;第二,应俟苏联对于派遣近卫使节作出答复后,再决定日本的态度。”^①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视苏联的态度,是注意到,波茨坦公告较之开罗会议宣言,将“日本无条件投降”改变为“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对于日本所十分重视的天皇制是否保留问题未作明确规定。日本认为这可能是苏联参与的结果,因此继续乞求苏联斡旋,并企图以其结果作为是否最后投降的依据。这一判断和结论都是错误的。

但是,这一本身是错误的决定,由于对公告“不予拒绝”,也同样遭到顽固坚持战争立场的军部及其他强硬派的抵制与反对。他们以各种方式,企图使日本继续进行战争。首先是关于对公告的新闻报导问题,按好战派主张,“为保证士气”对公告进行删节后才发表,并在发表后加以附注:“政府似对同盟国的公告不加理睬。”实质是宣布日本将继续进行战争。其后,军部四巨头,即两大臣和两统帅部长联合行动对铃木首相施加直接压力,于7月28日同铃木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第1631页。

进行“会谈”，“总理终于被强硬派的意见所打动”，^①当天下午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并无任何主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②显然是公开拒绝了公告并宣告要将继续进行战争。

盟军根据日本拒绝公告的态度，按预先的警告继续实施攻击。8月6日上午，美军在日本军工基地广岛上空投下一颗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的原子弹，这不仅是日本，也是人类社会自己第一次体验原子弹爆炸的痛苦。这一次爆炸使34.3万人口的广岛死亡7.8万，失踪及负伤5.1万，房屋大半被毁，罹灾人数达17.6万人，超过半数。

原子弹爆炸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8月8日下午天皇表态：“敌人既已使用这种武器，继续战争越发不可能了。为争取有利条件，不可错过结束战争的时机。”^③铃木首相也决定立即接受公告。同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按计划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宣布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到14日时断时续地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军部仍然不愿完全接受公告，要求实现体面的投降，至少要坚持4个条件：（1）国体问题即保留天皇制问题；（2）战犯问题由日本自主处理或盟军保证公正审判；（3）解除武装最好由日方自主解除；（4）盟军进占日本问题，最好不让占领，即令万不得已也应将东京除外，作象征性驻兵。军部主张，这些条件如

① 《日》《日本内阁史录》4，第458页。

②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第1633页。

③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第1637页。

得不到满足,日本就应“一亿玉碎”,战争到底。

会议召开进行讨论的第一天中午,美军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10日会议起草一份议案,附上军方的四项条件上奏天皇,经天皇裁决,放弃了盟军方面不会同意的四条件方案,另由外务省起草制定《关于接受美、英、中三国共同公告的照会》,由驻瑞士驻瑞典公使转达美、英、苏、中四国,要求迅速得到答复。其内容为:“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经苏联政府赞同的联合公告所列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即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利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获得保证,且切望迅速得到关于对此的明确表示。”12日美国作出广播答复:“自投降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最高统帅将行使认为适当的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盟国武装部队将留驻日本,直到实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目的为止。”^①

对此复文日本内阁仍议而不决,外务省主张全盘接受,军部表示如不明确国体则要继续进行战争。首相铃木的表态也大体倾向于军部。同时在皇宫内还召开了皇族会议,以统一思想。美军对日施加压力,继续轰炸日本关东及东北地区,还将日本的复函在日本各地上空播撒,以揭穿日本军政当局对民众的欺骗宣传。

14日决定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及内阁成员举行御前会议,这种大型会议为1941年12月1日决定开战后所未曾有,亦是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天皇挥泪表态:“不管我本人如何,也要营救国民的生命,……如果需要我向国民呼吁,我随时准备站在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第1657~1658页。

麦克风面前……必要时,由我亲自晓谕也行。”^① 由于天皇直接表态,才平息了各方面的意见分歧,最后决定接受公告,无条件投降。翌日播放由天皇亲自宣读的停战诏书,16日大本营向各地驻军下达停战命令。

日军少数极端好战分子曾策划发动兵变,枪杀了执行命令的近卫师团长,试图抢夺天皇讲话录音磁带。失败后两名策划分子自杀。8月27日盟军海军进入东京相模湾,28日首批占领军在厚木机场着陆,30日麦克阿瑟到达日本。9月2日,在停泊东京湾的密苏里军舰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军投降的签字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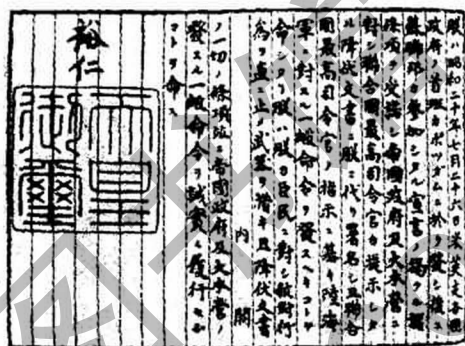


图 48 1945 年 8 月 14 日,
天皇御笔宣布投降

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于 9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南京举行。地点在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礼堂。由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代表侵华日军(不含东北关东军)及北纬 16°线以北的法属印支日军签署投降书。各地日军分批在中国 15 个城市及河内向中国政府投降。日军计有 1 个总司令部、3 个方面军、10 个集团军、36 个师团、41 个独混旅团及其他警备队、海军陆战队等共 128 万余人,伪军 95 万余人。在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已被歼灭,不在投降之列。驻河内日军(北纬 16°以北)由中国受降。香港原决定由中国受降,但因为英国坚持,中国被迫让步由英军受降。

中国除了在中国战区受降,还根据盟军统帅部决定,派出部队加入盟军占领军进驻日本。国民政府选定荣誉第二师担任驻日任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第 1669 页。

务。1946年6月,荣二师先遣部队曾抵达名古屋,筹建营房。后因国内战争爆发,未能实行。沦陷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回归中国,驻台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进行,其后决定以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日。



图 49 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会场:

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

650万军队分布在中国及东亚各地。这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吞噬或创伤了中国军民(不含东北、台湾)约2168万人,侵掠毁损财产1000亿美元以上。^①同时也使日本军队付出伤亡总数195万多人、非战斗人员(包括和平居民)65.8万余人的代价。^②另据新调查统计,中国

至此,由日本发动的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终以日本的完全失败而结束。

日军15年前侵占中国东北时,投入兵力数万人,总兵力不过数十万人。15年间,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推动之下,日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至投降时仍拥有



图 50 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向中国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上将递交投降书

①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解说词。

②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第2册,第1799页。

所受战争损失应获赔偿“约 3000 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 1200 亿美元,受害赔偿约 1800 亿美元”。^① 东方其他各国受害数字暂不计。这是一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惨剧。

战火终于熄灭了,留下了一堆堆有待于清理的废墟。

前路并非平坦笔直,毕竟打开了炼狱之门。

中国人,还有东方各民族,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① 江鹏九:《再论二战遗留下来的赔偿问题》,见《中国现代史》1992 年第 11 期。